

理想主义 对思想的 利用

Arvind Subramanian对
Michael Kremer的采访

经济学中的思想有时能够激发政策，政策又可以提升出更好的思想。但是由理想主义激发出的思想，然后带着极大的热情去追求这些思想的情况却是少见的。但正是这些品质成就了Michael Kremer，哈佛大学发展协会的“Gates”教授，他的许多同事和学生都认为他与众不同。

Kremer 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的同事和共同作者 Abhijit Banerjee 解释：“当大多数经济学家想出一个可以使世界变得更好的主意时，他们会认为自己一定是错了，否则这些主意没有等到他们想到的时候早就发挥作用了，所以他们就决定忘掉这个念头，尽管很不情愿。Michael 却立刻开始想怎样才能使这些想法变为现实”。

他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其聪明才智和不知疲倦的公众信仰为他铺平了道路去创造一个被称为先进市场推动疫苗计划（AMC）的新机制，这个机制可以进一步研发出新疫苗来抵抗肺炎球菌疾病，这种病每年将



夺走贫困国家百万个孩子的生命。罗伯特·巴罗，经济增长理论的大家、Kremer 在哈佛时期的导师这样说：AMC 的思想“可能给世界上最需要的国家改善医疗卫生状况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贡献”。

Kremer 还在实证发展经济学领域引进了一个主要的方法创新：公共政策干预的随机评价。这不仅在学术上帮助重建发展经济学这门学科，它还督促了世界上的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更严肃地评价其行为和行为之后的结果。他还做出了其他重大学术贡献，许多是围绕一个共同的主题，即找到协同工作（尤其是在国际层面上）提升穷人的福利水平的途径。与其共事的哈佛大学教授，诺贝尔奖的得主 Amartya Sen 强调：“Kremer 在经济理论与复杂的经验技巧的结合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并成功地把这种结合应用到发展经济学的关键的政策问题上”。

现年 43 岁的 Kremer 在堪萨斯州长大，毕业于哈佛大学。到南亚和肯尼亚的旅行——在那里他花了一年



的时间向学生教授数学和科学并且在偏远的肯尼亚西部的一个缺乏资源的学校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引发了他对发展的兴趣。Kremer 通过正在运营的世界教学组织（这个组织每年派送 370 名教师到世界各地的学校，包括像马歇尔岛这样的地方）继续其肯尼亚经历。他又从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接着获得教授职称（首先在麻省理工学院然后在哈佛获得）。

为穷人提供疫苗

2007年2月，五个国家——加拿大、意大利、挪威、俄罗斯和英国——和比尔和米琳达·盖茨基金宣布他们将投入 15 亿美元到先进市场推动疫苗计划（见专栏1），去帮助生产一种对抗像肺结核和脑膜炎这样的肺炎性疾病的疫苗。这种历史性的宣布使已经在这个方面研究数年的 Kremer 激动不已。

一旦疫苗被生产出来，先前承诺的为挽救生命的疫苗支付将会刺激生物工艺学和制药公司去生产可以在贫困国家适用的和可以负担起的疫苗。一直到今天为止，为穷国生产疫苗被认为是一项糟糕的商业

投资，公司不情愿将资金注入到那些消费者能够支付很少的疫苗的研发上。根据世界银行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的估计显示这个承诺可以阻止到 2030 年大约 540 万儿童的死亡。

如果这种方法确实起作用的话——并且这是个重大的设想——潜在的影响是巨大的。每年夺走 2000 万生命的疟疾和其他疾病将能够解决，并且这种方法甚至可以扩展到完全不同的领域，比如像撒哈拉以南非洲农业改革的技术。

当 Kremer——他在肯尼亚感染过天花——开始研究这个问题时，通过许诺购买以前已经被生产出来但没有被严格试用的疫苗来促进研究和发展的思想还没有受重视。他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想法首先发表在 1998 年的一篇被《经济学季刊》杂志出版的关于专利完全购买的学术论文中。他接着清楚地说明了先进市场推动疫苗计划（AMC）的经济学基本原理，并且在 2000 年在《创新政策和经济》杂志上发表的两篇论文为这个问

题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后来在与妻子 Rachel Glennerster 合著的《强大的医学》这本书中详细地阐述了更多细节。实践设计的复杂问题挑战人的智力：哪些疾病应该被囊括？候选疫苗的合适与否如何被决定？如果多种疫苗被生产出来会怎么样？疫苗接受国也需要做出贡献吗？公司应该被允许生产一种疫苗的多大份量？

但是指出这些分析被证明是非常容易的部分。Kremer 投入将近 10 年去宣传其思想并引起了各方的兴趣——学者、制药公司、政府和政策制订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开始也对此持怀疑态度。尽管对这个项目激动不已，但 Kremer 依然保持警惕。为了达到成功，必须以正确的框架启动——不是小事——并且如果这个思想被扩展到其他致命性疾病，成功也是必然的。

一种检验思想的新方法

在经济学领域，Kremer 最出名的是努力帮助研究者决定“真理”——也就是说，在竞争性理念中寻找冷静判断的方法。数年来，经济学家利用其他领域（比如医药）被称为“黄金标准”的方法进行随机试验。这些试验涉及随机选择两个大组，仅仅一组进行“治疗”，然后比较效果。事实上，这种方法被用于评价著名的墨西哥 PROGRESA 计划，这个计划涉及到向送孩子入学的

专栏 1

先进市场推动疫苗计划是什么？

一个先进市场推动疫苗计划（AMC）的目标是为将来的疫苗创建一个市场，这个市场大到而且可靠到刺激在疫苗研究方面的私人投资并且加速其开发和生产能力，以制造主要是用来解决发展中国家疾病的疫苗。

一个先进市场推动疫苗计划（AMC）需要赞助者（或者捐赠者）以法定金融承诺方式、先前已经同意的金额去支持市场。参与先进市场推动疫苗计划（AMC）的公司有义务以担保价格提供成功研制的疫苗。建立一个独立的调整委员会去决定疫苗是否符合那些标准。接着，只要发展中国家有有效需求（就是说，这些国家表达引进疫苗的意愿），公司就能够以已经商议的价格从先进市场推动疫苗计划（AMC）得到资金。

一旦先进市场推动疫苗计划（AMC）资金枯竭，在承诺条款之内，公司确保以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够承担的较低长期价格（即“尾部价格”）供应疫苗。当引进疫苗时，发展中国家也被期望对疫苗的成本做出贡献（“共同支付”），一直到先进市场推动疫苗计划耗尽资金为止，随后，以一个长期较低价格（可能与共同支付价格相同）购买疫苗。

家庭转移现金。那个计划的理想效果为其他国家实施类似的计划铺平了道路。

但是 Kremer 的真正贡献是显示这些试验可以在广泛的范围内去做。它不必仅仅局限于有巨大预算的政府评估特殊项目。在政府和非政府组织 (NGOS) 和学者之间的合作可以对这些问题使用一系列方法, 比较在相似环境下不同方法的成本效率, 阐明特殊项目的影响, 同时阐明较大的潜在问题。他显示了随机选择可能是低成本的——考虑到医药方面昂贵的花费——和灵活的, 当评价政府政策或干预时, 这种灵活性很难获得。

Kremer 发现随机评估的思想几乎是偶然的。在 1995 年, 当一个朋友提到他曾经工作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帮助七所学校建造更多的教室和提供教材和制服时, 他正在参观肯尼亚的一个村庄。Kremer 认为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应该考虑分阶段采用这些随机的新“干预”对研究效果的影响。后来在一篇使用随机化技巧的论文中, 他和在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合著者 Ted Miguel 认为用去虫药对儿童的大量治疗已经减少了 25% 的学校缺席率, 并且比其他提高出勤率的方法更有效 (见专栏 2)。

另外作为一种方法创新, 随机选择也有巨大的影响, Kremer 及其合作者所做的实验产生了对发展政策具有价值的经验, 常常颠覆了传统智慧。例如, 传统提高教育和卫生保障的方法常常不能运作并且有时由于扭曲基本系统而产生相反的效果。例如, 在肯尼亚, 教材的供应仅仅提高那些在课前预习学生的分数, 可能由于许多学生在官方课程上已经落后。并且学生一教师比例的下降没有导致测试分数有大的变化, 可能是因为学生在学生一教师比例下降之后, 教师不会改变他们的针对较多学生的教学方法。

相反, Kremer 及其合作者发现提供对供应者激励的项目更具有前途。例如, 在肯尼亚被学校委员会雇用的合同教师有可能比专职雇用的文职教师更多地在课堂上出现, 尽管其收入仅仅是文职教师的 1/4, 并且他们的学生在测试中做的好的多。哥伦比亚一个为贫困家庭送子女入学提供优惠购物券的项目带来了在学习中的大收获和很高的学业完成率。哥伦比亚的健康保障服务合同在健康服务提供方面巨大的改善就因为已经签订合同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采用以表现为基础来奖励健康工人的方法。

这些论文中根本方法论的创新带动了真正的家庭手工业, 在经济学方面几乎是一个新的学科。随机选择不仅仅用于解决教育和健康供给方面的问题, 而且用于更加广泛范围的问题上, 包括新工艺采用的决定、分散化的效果、控制腐败不同方法的效率以及移民的影

响。事实上, 怀疑随机评价影响的迹象已经出现 (见专栏 3)。

复兴微观发展经济学

不管随机选择的讨论如何, 毫无疑问, 随机选择将依然是实验经济学家工具箱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发展机构和私人慈善机构将可能采用这种方法评估其项目, 进而从将来的努力中总结教训。并且这种方法的引入有助于复兴发展经济学这门学科。

Kremer 提到作为 20 世纪 80 年代哈佛大学的研究生, 很少有同事从事这个领域, 最好和最聪明的同事都涌入到传统的国际经济学或者劳动经济学或者金融领域。在今天像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这样的学校, 发展经济学吸引了那些在以前从不会考虑这门学科的学生。Kremer 及其剑桥大学的同事 Banerjee 和 Esther Duflo 在这个领域的普及起到了关键作用。

Kremer 认为其研究的一个显著之处就是在传统上还没有被经济学家关注的领域创建设计市场的方法。例如, 他提出贸易许可倾向于逃避并且常常对被许可

专栏 2

随机选择: 新术语

随机试验的目的是确保结果是实际干预的结果而不是其他因素的结果。一种做法是随机决定逐步采用干预的次序。一个丹麦的非盈利机构和政府组织在肯尼亚西部除虫努力的案例中大约 3 万个在 75 个小学学校的儿童被治疗。由于财政和行政的限制, 治疗必须逐步进行。

Kremer 和 Ted Miguel 认为应该随机逐步进行。通过按字母顺序把学校分成三组并且把每 1/3 成一组。对第一组的除虫治疗在 1998—1999 年进行, 第二组的除虫治疗在 1999 年进行, 第三组的除虫治疗在 2001 年进行。1998 年第一组的学校出勤数的结果可以与第二组和第三组的学校相比较 (他们作为控制组), 1999 年的第一组和第三组学校的结果可以与第三组的学校结果相比较。

这个结果显示了除虫改善了儿童健康并且因此减少了 25% 的儿童缺勤率。有趣的是, 不仅那些接收治疗的学校缺勤率下降, 而且在这个地区的周围学校由于健康 (已经治疗) 儿童的感染减少缺勤率也下降。事实上, 这个研究的一个重要创新是能够相当精确地分辨出“外部因素”——也就是说, 健康和教育收益甚至扩展到那些没有接收治疗的地区。

国家的公民利益和独裁者或者他们所针对的政权损害一样多。相反，他和斯坦福大学 Seema Jayachandran 提出预期贷款许可。

例如，如果在一个富产石油的国家发生政变，联合国安理会宣称对这个政权的任何将来贷款将被认为是对政变领导人的贷款而不是后继政权的贷款，由于银行知道后继政权将有可能拒绝还贷，因此不愿意借款给许可政权。公民将减轻还贷负担，比如种族隔离的南非或者图季曼的克罗地亚，这已经引起了金融萧条或者对独裁者有利。

移民提供了另外一个例子。许多富裕国家正经历反对低技能移民的反弹，把它看作是不平等的表现。Kremer 和 Stanley Watt 认为至少一种形式的低技能移民，即作为女仆和保姆的妇女跨界移民将减少接收国居民的工资差异。这种情况发生是因为较好的和能够供应起的儿童照料使有高文化水平的母亲重返劳动市场，因此相比起非熟练工人来说，提高市场上熟练工人的供给。

Kremer 的文章涉及的问题较多：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之间的长期关系、大象和偷猎问题、挥霍的独裁者遗留的“恶债”问题（见2002年6月号《金融与发展》）、古董的保存以及参与麦加朝圣的影响。他的一篇早期论文探究了包括一系列任务的产品生产过程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任何一个错误将导致产品的毁坏。他认为“O型生产函数”（以挑战者航天飞机灾难的残余部

分命名）能够解释在发展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中的程式化事实，包括为什么全球化常常被看成增加对熟练工人的需求和增加发展中世界的的不平等。这个观点与标准的赫克歇尔—俄林贸易模型预测相反，该模型预测使用非熟练工人将减少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

“Kremer 认为其研究的一个显著之处就是在传统上还没有被经济学家关注的领域创建设计市场的方法。”

但是 Kremer 复兴发展经济学的贡献不仅仅在于提供新的方法和对这个学科的重视。作为一个教师和指导者 Kremer 同意做出巨大贡献。一个学生说在同 Kremer 工作的5年时间，Kremer 一直是在48小时内返回草稿。他提到 Kremer 在周末读他的关于市场的论文并且在晚上11点把论文返回到门口，并附有5页的打印好的评论。Ted Miguel 也指出 Kremer 的慷慨和公正。当 Kremer 建议按除虫论文上的字母顺序来决定第一作者时，Ted Miguel 说他很吃惊，因为两人都对“这篇论文做了大量的工作。”

留下遗产

在过去的多年中，Kremer 获得数不清的奖项，包括麦克阿瑟“天才人物”奖，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奖，美国科学最优50人研究奖和美国总统科学家和工程师早期职业奖。但是一个有争议的、对青年经济学家最著名的奖他还没有获得——约翰·贝茨·克拉克奖，这个奖由美国经济学会授予年龄小于40岁的最好的经济学家。在去年，2004年，这个奖项被芝加哥大学教授史蒂文·利瓦伊获得，其以沉闷科学《魔鬼经济学》这部著作出名。

这两个经济学家是实验经济学的两种有着显著差异的方法的一流开创者。Kremer 是进行随机分组和评价经济政策试验的强力提倡者，而利瓦伊依赖于“自然”试验——这种以“cute-onomics”作为特征的方法在获得巨大成功之后开始受到批判。他们各自遗产的持久性依赖于这两种方法能否在同辈的审视和学术风尚的变迁中存活下来。

Arvind Subramanian, Peterson 国际经济研究所和全球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教授。

专栏 3

随机选择的局限

随机选择的极大优点就是可以产生比较可靠的、Kremer 认为由于透明度能够影响决策者的证据。但是批评认为尽管随机选择在宏观背景对于所提问的问题有益，但它不能解决较大的问题，比如解释不同国家之间健康结果的差异是什么，或者哪一个汇率政策比较好。这不仅因为随机试验能够在宏观水平做而且因为政策或者干预有时产生通过试验方法不能获得的“外部因素”。一个例子就是健康在收入方面的效果。在个体水平上，较好的健康将使较健康的人能够较长时间和较好质量的工作从而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并因此获得更高的收入。但是人们不能对宏观发现加总因为较好的健康导致损坏整体增长效果的较大人口数量。